

欧亚备要

芮传明 著

# 古突厥碑铭研究

(增订本)



商务印书馆  
The Commercial Press

# 古突厥碑铭研究

(增订本)

芮传明 著



 商务印书馆  
创于1897 The Commercial Press

2017年·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古突厥碑铭研究 / 芮传明著. — 增订本. —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17

(欧亚备要)

ISBN 978-7-100-13001-1

I. ①古… II. ①芮… III. ①突厥语—碑铭学—研究  
IV. ①K877.42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7) 第042257号

权利保留, 侵权必究。

古突厥碑铭研究

(增订本)

芮传明 著

商务印书馆出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36号 邮政编码 100710)

商务印书馆发行  
三河市尚艺印装有限公司印刷  
ISBN 978-7-100-13001-1

2017年6月第1版 开本 710×1000 1/16  
2017年6月第1次印刷 印张 20 1/2

定价: 82.00元



# 欧亚 备要

deq100103

主办：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内陆欧亚学研究中心

主编：余太山 李锦绣

## 编者的话

《欧亚备要》丛书所谓“欧亚”指内陆欧亚（Central Eurasia）。这是一个地理范畴，大致包括东北亚、北亚、中亚和东中欧。这一广袤地区的中央是一片大草原。在古代，由于游牧部族的活动，内陆欧亚各部（包括其周边）无论在政治、经济还是文化上都有了密切的联系。因此，内陆欧亚常常被研究者视作一个整体。

尽管司马迁的《史记》已有关于内陆欧亚的丰富记载，但我国对内陆欧亚历史文化的研究在很多方面长期落后于国际学界。我们认识到这一点并开始急起直追，严格说来是在 20 世纪 70 年代末。当时筚路蓝缕的情景，不少人记忆犹新。

由于内陆欧亚研究难度大，早期的研究者要克服的障碍往往多于其他学科。这也体现在成果的发表方面：即使付梓，印数既少，错讹又多，再版希望渺茫，不少论著终于绝版。

有鉴于此，商务印书馆发大愿心，选择若干较优秀、尤急需者，请作者修订重印。不言而喻，这些原来分属各传统领域的著作（专著、资料、译作等）在“欧亚”的名义下汇聚在一起，有利于读者和研究者视野的开拓，其意义显然超越了单纯的再版。

应该指出的是，由于出版时期、出版单位不同，尤其是研究对象的不同，导致诸书体例上的差异，这次重新出版仅就若干大的方面做了调整，其余保持原状，无意划一，借此或可略窥本学科之发展轨迹也。

愿本丛书日积月累，为推动内陆欧亚历史文化的研究起一点作用。

余太山

## 再版前言

承商务印书馆和丛书主编余太山先生的厚意，将拙著以再版形式纳入《欧亚备要》。说实话，这一好意曾令我颇为为难：按理说，由于本书的主要内容成于二十余年前，而当时的客观学术环境和笔者的主观学术水平都不及今天，故应该趁此机会做一番认真的修改和增补，尽可能提高本书的质量。然而，笔者在本书于1998年出版后，已经改而研究其他专题，故这些年来在“古突厥碑铭”方面几无长进，很难将质量提高许多；则纯粹“重印”亦未尝不是可选方案。

不过，若竟完全“重印”，则总觉有愧于心，有负于读者。特别是，据张铁山先生转告，中央民族大学多年来一直将此书作为突厥语专业研究生的辅助读物之一，则我若不尽力充填一些“新”的东西，也对不起读者诸君了。念及此，遂决定对本书的“再版本”做如下安排：

第一，全书的总体结构和顺序基本不变，原版的观点和论证也仍旧。这既足以保留该书的原貌，同时也确实不可能再做大幅调整。

第二，对于初版以来，学界对相关问题的不同观点和看法，以及某些新的资讯和提法，只要笔者注意到的，均以页下注的形式标示出来；而原版的注释（有的篇幅甚大，达数页），则仍以篇末注的形式排列，若对它们有所说明，也用页下注标示。

第三，原版书将五份古突厥文碑铭的汉译文及其注释列为“附录”，今则改成“附录一”，并增添“附录二”，在其中列入两篇与突厥先祖有关的旧文，以便读者加深对突厥文化的理解。

第四，原版的“主要参考书目”，大体上只限于笔者在撰写本书时涉及的著述，显然比较散乱，并且缺失颇多。再版本则改作“相关参考著述”，

一是专题主要集中于“突厥碑铭”和“突厥语”，二是即使是本书笔者并未使用过的著述，只要与这些专题相关，就尽量收入，特别是近年来的新著，以拓宽读者的眼界。

第五，书末所设“索引”为原版所无，以利读者阅读。

第六，当然，再版本对通篇做了校对，以尽量减少“技术性”错误，对原版的笔误、印刷错误以及少量不是很“达”的句子做了修正。

《古突厥碑铭研究》再版本的问世，一要感谢余太山先生的鼓励和督促，二要感谢耿世民、吴玉贵、张铁山等先生近年来有关突厥碑铭、突厥语言和突厥历史的许多著述所提供的见解和资料，三当然也要感谢这些年来关心本书内容，特别是持有不同看法的各位同仁（例如，王颀先生早就致函于我，提出了好几个问题和看法）。是所有这些人的直接和间接帮助，使得这一“再版书”不至于以完全的“旧貌”面世，若因此稍益于读者和学界，则吾愿足矣！但是，颇感遗憾的一点是：本来，张铁山先生允诺将自己在突厥语教学过程中对碑铭译文的许多新见和异见整理出来，提供给我，但终因公务过于繁忙而未能如愿。这实是本书再版本的一大损失，故只能俟之将来了。即使如此，仍对张先生的热情诚致谢意。

最后，本书的基础最初是先师章丹枫（巽）先生为我设计的博士生毕业论文的主题，故追根溯源，我之所以在这一领域略有小成，也属恩师所赐。适值他老仙逝近二十载之际，此书得以再版，也可聊慰其在天之灵。

芮传明

2011年9月

## 前言

本书所研究的五种碑铭，乃是后突厥汗国时期（7世纪80年代至8世纪上半叶）诸领袖的墓志铭，亦即纪功碑。由于这些碑铭涉及古代突厥人的历史、文化等问题，所以本书称之为“古突厥碑铭”。五块古突厥碑均设立在蒙古高原上，其中的两块（阙特勤碑与毗伽可汗碑）被发现于1889年，翁金碑被发现于1891年，噶欲谷碑被发现于1897年，阙利啜碑则被发现于1912年（有关诸碑的具体情况，可参看附录一各碑的注释1）。

五块碑铭使用的文字全都相同，由于其外形与古代日耳曼人所用的Runic文字颇相类似，故而早期的西方学者往往称之为Runic文，译成汉文便作“如尼文”或“卢尼文”、“鲁尼文”。然而，它还曾有过其他各种名称，如拉德洛夫称之为“古突厥文”，班格称之为“蓝突厥文”，汤姆森则称“如尼突厥文”、“古突厥文”、“古鄂尔浑突厥文”，或者“鄂尔浑文”。自从冯·加班的《古突厥语语法》<sup>①</sup>一书问世之后，“古突厥文”一名便更加流行了，尽管塔拉特·特金在20世纪60年代仍称之为“鄂尔浑突厥文”。本书则从拉德洛夫，称之为“古突厥文”。

阙特勤碑与毗伽可汗碑被发现之后，俄国学者拉德洛夫和丹麦学者汤姆森旋即积极地从事古突厥文的解读工作，并在不久后都取得了重大的进展。

---

① 即 Annemarie von Gabain, *Altürkische Grammatik: mit Bibliographie, Lesestücken und Wörterverzeichnis auch Neutürkisch*, 2. verbesserte Auflage, O. Harrassowitz, Leipzig, 1950。是为第二版，初版出版于1941年，因时值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故未能广为流布；第三版则于1974年在 Wiesbaden 出版。耿世民对此则有汉译本：《古代突厥语语法》，内蒙古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

拉德洛夫有《突厥方言词典试编》、《蒙古古突厥碑铭》等著述<sup>①</sup>, 汤姆森则有《鄂尔浑碑铭释读》、《蒙古古代突厥文碑铭》等著述。<sup>②</sup>

继他们之后, 将近一个世纪内, 各国学者对古突厥碑铭及其文字进行日益深入的探讨, 其中颇有影响者, 如马迦特《古突厥碑年代考》、奥尔昆《古代突厥文献》、小野川秀美《突厥碑文译注》、冯·加班《古突厥语法》、马洛夫《古代突厥文献》、阿勒托《蒙古古代突厥碑文材料》、吉罗《巴颜楚克图碑考释》、克利亚什托尔内《古代突厥鲁尼文碑铭》、塔拉特·特金《鄂尔浑突厥语法》等。这些学者的国籍包括俄国、丹麦、德国、土耳其、日本、芬兰、法国、美国等。

不得不承认的一个事实是, 迄今为止, 中国学者对于古突厥碑铭的研究远远落后于国外学者。直到 20 世纪 30 年代, 才由韩儒林先生首先从德文转译了阙特勤碑、毗伽可汗碑及噶欲谷碑; 此后, 岑仲勉先生也从英文转译了这三种碑铭, 于 50 年代正式刊载在其《突厥集史》中。耿世民先生全部译出了五种碑铭, 但是其译文到 80 年代后期才正式发表。<sup>③</sup>

① 拉德洛夫为俄国著名突厥学家, 其大量相关著作奠定了突厥语言学的基础。他最大的一部著作是《突厥方言词典试编》(*Versuch eines Wörterbuchs der Türk-Dialecte*)。他早在 1859 年就开始收集材料, 于 1888 年出版了第一册, 至 1911 年出版最后一册, 将分散的二十四册合成四大册, 迄今仍无可取代者; 1960 年有重印本: W. Radloff, *Versuch eines Wörterbuches der Türk-Dialecte*, 4 Vols., repr. The Hague, 1960。此外, 他对于蒙古之古突厥碑文的解读和研究, 也是成果卓著, 在 1894 至 1899 年期间, 相继发表了五册《蒙古古突厥碑铭》(*Die alttürkischen Inschriften der Mongolei*): *Die alttürkischen Inschriften der Mongolei*, I-III, Petersburg, 1894-1895; *Die alttürkischen Inschriften der Mongolei*, Neue Folge, Petersburg, 1897; *Die alttürkischen Inschriften der Mongolei*, Zweite Folge, Petersburg, 1899。

② 汤姆森是著名的丹麦语言学家, 除欧洲语言外, 他还通晓梵、阿、俄、芬、匈等文字, 他一生最为辉煌的业绩便是对古突厥文的解读, 以及对古突厥碑铭与写本的研究。他那刊于《芬兰—乌古尔学会会刊》第五期上的对阙特勤碑和毗伽可汗碑的研究名著《鄂尔浑碑铭释读》, 不仅是当时的开先河之作, 而且至今仍有很大意义 (V. Thomsen, *Inscriptions de l'Orkhon déchiffrees*, *Memoires de la Societe Finno-Ougrienne*, V, 1896)。他的《蒙古古代突厥文碑铭》一文包括了噶欲谷碑、阙特勤碑和毗伽可汗碑三碑的丹麦文研究, 于 1922 年刊出 (*Gammel-tyrkiske indskrifter fra Mongoliet, i oversættelse og med indlæning*, *Samlede afhandlinger III*, 1922), 旋即由 H. H. Schaeder 译成德文, 发表在《德国东方学会会刊》上 (*ZDMG*, LXXVIII, N. F. III, 1924-1925, pp.121-175)。

③ 当然, 正当本书初版撰写的 20 世纪 90 年代, 中外学术界对于古突厥碑文的研究进入了更趋发展的时期, 即耿世民先生归纳的“第三阶段”, 始于土耳其和日本的学者: 土耳其组织了“土耳其国际合作部”(Turkish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Administration), 与蒙古组成联合考察队, 对古碑铭与文物进行大规模考察研究, 出版了多种大型图录。日本则组织了为期三年(1996—1998)的专门考察规划, 对诸碑再做深入考察。而中国在这方面也有相当大的进展, 以耿世民为首的中国学者们在最近十多年来撰写了不少与碑铭及突厥语相关的著述, 其中尤以耿世民的《古代突厥文碑铭研究》(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 2005 年版)、《古代突厥语语法》(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 2010 年版)及张铁山的《突厥语族文献学》等为著。

尽管国外学者对古突厥碑铭进行过长期的探讨，撰写了大量的专著和论文，其中不乏系统的研究，但是仍然不能认为，有关古突厥碑铭的一切问题均已得到圆满的解决。

与中国学者相比，从事古突厥碑铭研究的国外学者之古突厥语知识和其他外语知识的普遍水平要高出一筹，但是，他们的古汉语知识却有所不及，甚至相差甚远。而众所周知的是，这些碑铭所反映的史实与中原王朝密切相关，因此，如若不能充分地结合汉文史料与古突厥文史料，则碑铭的研究难免出现舛误与疏漏。实际上，有些国外学者只能利用译成外文的中国古籍，其研究的深度与广度也就更受限制了。

我试图尽可能地改善这种状况，充分发挥一名中国学者在汉文史料拥有和使用方面的优势，同时尽量借鉴前辈学者的研究成果，以使读者能够更加全面地理解碑铭内容。

对于中国学术界而言，迄今为止，除了岑仲勉先生曾对阙特勤碑、毗伽可汗碑和噶欲谷碑做过较详细的注释（但这毕竟是注释，未能形成系统）外，并未见过针对古突厥碑铭的系统研究。所以，本书的主旨之一乃是试图对国外学者的若干观点重新讨论，对国内的这一“空白”予以填补。本书正文围绕古突厥文碑铭展开的一系列研究即意在于此。

由于古突厥碑铭撰成于后突厥汗国的同时代，并且，除了风化蚀损之外，其文字内容不可能有任何篡改，故而这些铭文应该是最能真实反映古突厥人之历史、文化状貌的原始资料。事实上，现代学者也确实将它们视作可靠的原始资料而经常加以引用。然而，如今人们所引用的译文是否完全体现了当初铭文撰写者的本意？假若译文有误，尤其是在关键之处有误，岂非会导致研究者得出错误的结论？或者，即使译文仅是出现较多的存疑之处，显然也会影响碑铭的利用价值。

诚然，汉文旧译曾为中国学者提供了很大的方便，为他们的研究做出过很大的贡献，但是，这些译文毕竟尚有若干不足之处。本书的主旨之二便是试图弥补汉文旧译的这些缺陷，尽可能提供一份更高质量的碑铭汉译文。

本书附录中的译文以塔拉特·特金 *A Grammar Orkhon Turkic* 一书中的英译文为主要参照本，在认定其译文与古突厥铭文之原意并无原则出入的情况下，通常按其辞句译出；若特金有误，则按更正确者改定。凡专名之译有所

据者，必在注内或正文的考证中予以说明；无所据而只能做一般性音译者，则未必一一指明。本书对于碑铭译文的原则是：尽量使用现代语言；力求文意格外通顺；遣词造句更加确切；消除任何非汉文字；争取译名必有所据。

最后，必须说明的是，上述的两个主旨只是我的努力方向，而不敢妄言已经达到这一目标。本书所做的研究，只能说是比较系统地探讨了有关碑铭的主要问题，并非“面面俱到”。我不敢奢望——事实上也不可能——毕其功于一役，也无法利用这本篇幅不大的书来解决有关碑铭的所有问题。实际上，即使是我能够发现的那些问题，也无法全部在本书中进行讨论，诸如宗教、语言、经济等方面便未能深入讨论。

此外，本书的碑铭译文也不可能尽善尽美，尤其是其中的人名、地名、族名，迄今尚无法全部考证、比定；况且，即使有所比定，也仅是一家之言，难免舛讹。因此，我只希望这些译文在旧译的基础上有一定的改善和提高，距碑文原作者的初意更接近一点。

总而言之，此书旨在抛砖引玉，令更多的学者——尤其是中国学者——从事这方面的深入研究，推动我国的中亚研究步入更高的层次。

# 目 录

## 第一章 后突厥政权早期根据地考

- 第一节 诸说概述 ..... 002
- 第二节 坚固的漠南根据地 ..... 005
- 第三节 总材山—黑沙根据地在白云鄂博周近 ..... 010

## 第二章 后突厥政权“东征”事件考

- 第一节 默啜可汗时期的重大事件——“东征” ..... 023
- 第二节 “东征”的主要内容 ..... 027
- 第三节 *yašıl ögüz*即西拉木伦河 ..... 032

## 第三章 后突厥政权“西征”述考

- 第一节 关于突厥“西征”的日期 ..... 039
- 第二节 不成功的早期“西征” ..... 044
- 第三节 景龙三年年底或景云元年年初突厥击破黠戛斯 ..... 049
- 第四节 景云元年夏到景云二年冬突厥大军与突骑施相持于阿尔泰山 ..... 052
- 第五节 景云二年冬噉欲谷主动出击突骑施 ..... 056
- 第六节 先天元年春噉欲谷进入索格底亚那 ..... 061

## 第四章 后突厥征讨黠戛斯的行军路线考

- 第一节 aq tärnil 的比定 ..... 066
- 第二节 “骑马踏雪前进”的行程和攀登雪山 ..... 069
- 第三节 “雪障”及奔袭阿尼河的路线 ..... 071

## 第五章 后突厥与突骑施交战地点考

- 第一节 交战地点之今地比定的异说 ..... 077
- 第二节 战场在塔尔巴哈台地区 ..... 080
- 第三节 yarıs 平原与 bolču 的比定 ..... 084
- 第四节 与毗伽—阙特勤部队有关的地理问题 ..... 089

## 第六章 后突厥远征 Kāčīn 事件考述

- 第一节 远征 Kāčīn 事件的比定 ..... 094
- 第二节 远征 Kāčīn 的具体过程考证 ..... 102

## 第七章 Tabγač 考释

- 第一节 Tabγač 之语源为“大汉” ..... 110
- 第二节 “大家”、“宅家”即是 Tabγač qayan ..... 118

## 第八章 坐骑名号考释

- 第一节 可能已被汉人熟悉和使用的马名 ..... 124
- 第二节 碑文中其他马名的考释 ..... 131
- 第三节 坐骑的荣誉性称号考述 ..... 134

## 第九章 族名综考

- 第一节 čöllüg 与“叱利”、“敕勒” ..... 144
- 第二节 sir 与“薛” ..... 148

|     |                                 |     |
|-----|---------------------------------|-----|
| 第三节 | bärčik är 与 abar čakär 之辨 ..... | 153 |
|-----|---------------------------------|-----|

## 第十章 官号与称衔述考

|     |                            |     |
|-----|----------------------------|-----|
| 第一节 | qayan、qan 与 “可汗”、“汗” ..... | 162 |
| 第二节 | qapγan 与 “夹毕汗” .....       | 170 |
| 第三节 | el-täbär 与 “颉利吐发” .....    | 174 |

## 附录一 古突厥碑铭译注

|             |     |
|-------------|-----|
| 阙特勤碑 .....  | 177 |
| 毗伽可汗碑 ..... | 227 |
| 瞰欲谷碑 .....  | 241 |
| 翁金碑 .....   | 259 |
| 阙利啜碑 .....  | 267 |

## 附录二 相关论文再刊

|                   |     |
|-------------------|-----|
| 阿史那人“史前”居地考 ..... | 272 |
| 古突厥先祖传说考 .....    | 289 |

|           |     |
|-----------|-----|
| 缩略语 ..... | 301 |
|-----------|-----|

|              |     |
|--------------|-----|
| 相关参考著述 ..... | 304 |
|--------------|-----|

|           |     |
|-----------|-----|
| 索 引 ..... | 310 |
|-----------|-----|

|            |     |
|------------|-----|
| 原版后记 ..... | 316 |
|------------|-----|

# 第一章 后突厥政权早期根据地考

噉欲谷第一碑西面 7 行载云：“颉跌利施向南杀死了大量汉人，向东杀死了大量契丹人，向北杀死了大量乌古斯人。我成为他的参谋和军事指挥官。我们那时居住在 čoyay quz 及 Kara-Kum 地区。”又，阙特勤碑（下文简称“阙碑”）南 3 行及 6—7 行载云：“只要突厥可汗在 ötükan 山实施统治，境内便无忧患。……如果你们试图移居到南方的 čoyay yiš 及吐葛尔统平原，突厥人啊，你们便将死亡。”

在此，噉欲谷碑（下文简称“噉碑”）所谓的“颉跌利施”即是突厥称衔 elteriš 的汉文对译名，有“监督”、“管束”之义，为突厥民族中最高统治者的美称之一。它在这里即是指后突厥汗国的奠基者和第一任可汗骨咄禄。所以，颉跌利施建立政权之初的居地 čoyay quz（或 čoyay yiš）与 Kara-Kum 便是后突厥汗国早期的主要根据地。至于阙碑所述阙特勤的事迹，大多在毗伽可汗时代，其时已处后突厥政权的中期，汗国的主要根据地业已移至漠北的 ötükan 山区。因此，碑文告诫突厥民众不要南下 čoyay 山区（yiš 有“山林”之义，各家对此多无异议），以免陷入汉人的圈套，遭受伤害。

上引两段文字，是本书所收有关后突厥政权的五大古突厥文碑铭中，提及 čoyay (quz) 与 Kara-Kum 两地名的全部资料。这方面的古突厥文原始资料虽然为数甚少，并且语焉不详，但是其重要性并不因此稍减。后突厥汗国早期的根据地究竟位于何处？这不仅仅是一个单纯的地理问题，它更涉及突厥与周邻诸政权，尤其是与中原政权的各种关系，以及汗国早期历史之真相等重大问题。所以，碑文中 čoyay (quz) 与 Kara-Kum 的地理方位必须要搞清楚。遗憾的是，这一问题至今仍未得到满意的解决。

诚然，有关 čoyay (quz) 与 Kara-Kum 之地理位置的讨论早就展开，不过，

一百年来依然众说纷纭，即使对于它们的大致方位，也多大相径庭。因此，这里仍有必要对此做一番认真的探索。

## 第一节 诸说概述

历年来，国内外学者关于 čoyay (quz) 与 Kara-Kum 地理方位的观点可以粗略地分为两大类：“漠北说”与“漠南说”。丹麦学者汤姆森是早期持“漠北说”的权威人士之一，他认为 Kara-Kum 肯定是指杭爱山的西部分支；至于 čoyay (quz) 则是指杭爱山脉南端的平原。<sup>1</sup> 法国学者格鲁赛将 Kara-Kum 置于赛音诺颜之南<sup>2</sup>，而赛音诺颜即是色楞格河以南、鄂尔浑河上游，以及土拉河、翁金河流域，易言之，在他看来，后突厥政权的早期根据地也位于漠北地区。

去今不远，持“漠北说”并考证较详的一位学者，乃是法国人勒内·吉罗。他认为，Kara-Kum 是翁金河中游以北的一片沙漠地区的名称；而 čoyay (quz) 之义即为 l'endroit ombragé des Saponaires（肥皂草林荫地），其地是杭爱山脉的东南分支，在翁金河的上游附近。吉罗如此描述骨咄禄可汗的这些早期根据地：

蒙古的自然地形图（1954 年莫斯科出版的地图集，第 57 页）指出，在东经 103° 和北纬 45°15' 的地区周围，有一片沙漠地区，从东至西近 65 公里，从南到北有近 40 公里。这是该地区唯一一块真正的沙漠地区。此地四周为泥潭沼泽，因此是一片潮湿地。其高度略超过海拔 1000 米。它完全具有冬牧场的特点。我们证据十足地认为，这里确实是指 Kara-Kum，即骨咄禄可汗的冬帐。

在英文地图中，这一地区附近有一个村庄，叫霍勒特（Kholte），在翁金村以南。

为了更加具体地确定肥皂草山林的地点，我们还使用了蒙古植物图。严格地说来，此地名应该考证为 čoyay yiš。为了能够顺利地进山放牧，必须找到一个山林区，它离前一个地方不远。我们确实在前述地区